

基于乡村多功能理论的贫困村域 演变特征与振兴路径探讨 ——以海南省什寒村为例

马 历^{1,2,3}, 龙花楼^{1,2,3*}, 屠爽爽^{1,4}, 张英男^{1,2,3}

(1.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北京 100101; 2. 中国科学院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 北京 100049;

3. 中国科学院区域可持续发展分析与模拟重点实验室, 北京 100101;

4. 南宁师范大学地理与海洋研究院, 南宁 530001)

摘 要:对于多数农村地区而言, 贫困是制约乡村发展的重要因素, 为摆脱对农业的过度依赖和单一生产功能, 乡村多功能逐步进入人们的视野并日渐受到关注, 在很大程度上多功能路径有助于减少贫困发生率, 并提高农村社区和家庭面对生存压力的能力。论文立足于乡村振兴的时代背景, 在阐释乡村多功能概念内涵的基础上, 采用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 基于多功能视角剖析贫困村域乡村发展的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 总结提炼其创新发展模式, 在此基础上进一步探讨贫困村域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结果表明: ① 在内外驱动力作用下, 海南省什寒村实现了从弱势的贫困农村向产品多样化的多功能乡村转变; ② 乡村农业生产、就业与社会保障、生态保育及文化传承等多项功能的协调发展, 对于提高农村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增强乡村弹性具有积极意义; ③ 驱动乡村多功能演化的因素包含政策支持、市场需求、自然本底、资金技术、行为主体和文化特质等多个方面; ④ 针对贫困村域乡村发展存在的制约因素, 提出从宏观层面提供乡村振兴外助力、从中观层面促进乡村振兴交互力、从微观层面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力, 通过总体谋划、各个击破以实现乡村振兴。最后从多功能视角, 对乡村振兴发展的困境与出路进行了探讨。

关 键 词:乡村振兴; 农村贫困化; 乡村多功能理论; 路径选择; 海南省

改革开放以来, 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速, 城乡间和地域间人口、土地、资金等生产要素的流动带动了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的持续提高和现代生产、生活方式的扩散, 粮食生产能力稳步上升、农民收入持续增长, 农村民生得到全面的发展和改善, 整体上加速了中国乡村的现代化进程(戈大专等, 2017; 龙花楼等, 2018a)。然而, 传统的农业农村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以牺牲乡村环境和乡村社会机理脆弱化为

代价的, 也造成了乡村经济对外部支持的过度依赖(房艳刚等, 2015)。在人口激增、经济发展和全球化等时代背景下, 城乡差距增大、农业基础不牢、“乡村病”日趋严峻等多种矛盾加剧(傅伯杰, 2017; 刘彦随, 2018), 农村空心化、人口老龄化、深度贫困化、耕地非农化与非粮化、宅基地闲置和粗放利用(刘彦随等, 2016; 龙花楼等, 2018b)等一系列问题给农民生计和乡村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

收稿日期: 2019-02-15; 修订日期: 2019-04-16。

基金项目: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41731286, 41971216, 41901207); 中国科学院科技扶贫项目(fp-2018-4)。[Foundation: National Natural Science Foundation of China, No. 41731286, 41971216 and 41901207; Project of Poverty Alleviation Supported by Science and Technology, CAS, No. fp-2018-4.]

第一作者简介: 马历(1991—), 女, 四川宜宾人, 博士生,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转型。

E-mail: mal.17b@igsrr.ac.cn

*通信作者简介: 龙花楼(1971—), 男, 湖南醴陵人, 博士, 研究员, 博士生导师, 主要研究方向为城乡发展与土地利用转型。

E-mail: longhl@igsrr.ac.cn

引用格式: 马历, 龙花楼, 屠爽爽, 等. 2019. 基于乡村多功能理论的贫困村域演变特征与振兴路径探讨: 以海南省什寒村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38(9): 1435-1446. [Ma L, Long H L, Tu S S, et al. 2019. Characteristics of change and vitalization pathways of poor villages based on multifunctional rural development theory: A case study of Zahan Village in Hainan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38(9): 1435-1446.] DOI: 10.18306/dlkxjz.2019.09.016

遇。“三农”问题是关系到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如何扭转目前乡村落后、衰败的局势,成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Liu et al, 2017)。

党的十九大审时度势,在新农村建设、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等宏观战略基础上创新性地提出乡村振兴战略,为破解中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化解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提供了路径选择。贫困是乡村发展的最大短板,消除贫困也是乡村振兴的重点和难点。近年来,关于乡村贫困的研究主要聚焦于贫困的测度与分解(陈烨烽等, 2016)、贫困化机理、原因、政策及时空分异特征(龙花楼等, 2016; 刘彦随等, 2017)等方面,而对贫困地区乡村的多功能性及从多层级探讨乡村发展的典型模式和振兴路径关注较少。多功能理论在刻画乡村地域的人口、技术、环境等多要素转型发展方面具有显著优势。中国疆域辽阔,乡村系统结构、功能、发展水平和阶段均存在显著的空间差异性,贫困地区的致贫原因和制约因素也存在较大差别,加强不同贫困区域的研究,有助于甄别特定乡村地域系统在发展过程中所存在的典型问题,为统筹城乡发展和乡村振兴战略的科学决策提供参考(刘彦随, 2018; 龙花楼, 张英男等, 2018);对贫困区域乡村发展典型模式的剖析有助于发挥引领带动作用,为其他条件成熟的区域提供指导和示范。目前国内基于多功能视角的村域发展研究多集中于内陆地区(李平星等, 2014; 唐林楠等, 2016; 洪惠坤等, 2017; 谭雪兰等, 2017),鲜见关于沿海和海岛省域的相关研究。海南省作为中国仅次于台湾的第二大岛,是中国社会经济发展全局中具有战略性作用的特殊区域(李敏纳等, 2017),其贫困地区乡村多功能演化特征与路径研究,对于海南省全面实现乡村振兴、丰富中国乡村发展的理论与实践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因此,本文通过实地调研和半结构式访谈等方法,基于乡村多功能理论从扶贫开发和乡村重构视角对海南省贫困村域乡村多功能演进特征、驱动因素和振兴路径展开研究,以期为实现海南省乃至全国城乡融合和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1 乡村多功能理论与乡村振兴

1.1 乡村多功能理论的科学内涵

随着城镇化和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乡村地域系统由传统单一农产品生产功能向工业、休闲服务

业、商品零售等多功能转变,乡村已由昔日的相对重视农产品生产与农村社会稳定,转向更加强调农业与乡村的多重功能(Wilson, 2009)。为应对快速城镇化、环境退化、贫困和粮食不安全等问题,多功能农业概念被提出(陈秧分等, 2018)。农业多功能性(multifunctionality)是指农业能产生多元的、相互联系的结果和效应,具有综合性、地域性和集成性(Renting et al, 2009; Wilson, 2010b)。20世纪80年代末多功能农业的思想开始出现在一些文献和政策文件中,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发布的21世纪议程(第14条)首次提出农业政策应该考虑农业的“多功能”特征,1993年欧洲理事会关于农业法律的文件首次官方使用了“多功能农业”(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的概念(Pribadi et al, 2017)。

乡村多功能(multifunctional rural)是多功能农业理论的进一步深化,是指乡村通过发挥自身属性及其与其他系统共同作用所产生的对自然界或人类发展有益作用的综合特性,具有明显的空间异质性和时间变异性(刘彦随等, 2011)。其内涵包括2个方面:一是强调农村经济多样化,以摆脱对农业的过度依赖;二是将自然环境保护和人力资源开发的优先领域相结合。房艳刚等(2015)认为乡村是由社会、经济和环境组成的复杂系统,是人类重要的工作、居住地点和环境空间,从区域人地关系地域系统角度看,主要有以下功能:一是通过农业生产空间,永续地提供充足的资源品,即农业生产功能;二是作为维持农民生活和农村稳定的空间载体,对农民生产生活起着重要保障作用,即就业与社会保障功能;三是通过生态空间为非自律的城市生态系统提供环境负熵流,容纳消解污染物,即生态保育功能。此外,乡村除了给人以休闲、审美和教育的价值外,还承担着维护乡村原有生活形态、保留农村文化多样性遗产、传承和发扬传统历史文化等功能,即文化传承功能(刘玉等, 2012; 房艳刚等, 2015)。促成农村资源使用的多功能和空间异质性增强(即乡村多功能转变)主要包含3大驱动因素(Holmes, 2006):一是农业产能过剩。随着科学技术进步,推动了有利地区的农业规模化和集约化,农业产能过剩和冗余促使对这些价值的再认识,推动农业功能发生转换。二是以市场为主导的多元价值的出现。农业产能过剩和冗余可以促进对乡村多功能价值的认识,促进农业向其他职业模式的转变,推动乡村多功能演化。三是社会对可持续发展和环

境保护问题的意识提升。乡村多功能成为地理学研究的重要课题,为面临就业非农化与居住城市化压力的乡村发展提出了明确需求,也为乡村振兴提供了良好机遇(李智等, 2017; 徐凯等, 2019)。

1.2 乡村多功能与乡村振兴

乡村多功能理论强调乡村多重功能的协调和统一,为乡村发展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和理论范式。加强贫困地区乡村多功能的研究对于明确乡村发展方向、优化资源配置,实现乡村社会、经济、文化和环境的多元复合价值和全面的乡村振兴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本文通过阐释乡村多功能与乡村振兴的内在联系,为探讨多功能视角下乡村振兴发展提供理论支撑。乡村多功能和乡村振兴之间存在着相互促进和抑制作用,主要表现如下(图1):

(1) 乡村多功能与乡村发展的相互促进作用。

① 乡村多功能的发展,对于实现乡村社会、经济 and 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有助于提高农村社区应对内生变化和外部干扰的能力,增强乡村弹性;② 通过乡村多样化途径,有助于摆脱对农业过度依赖和单一生产功能途径(DeRosa et al, 2019),从而优化乡村内部结构和功能。③ 对于地理区位条件相对落后的地区而言,乡村多功能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贫困的一种回应,通过多种策略帮助农村社区和家庭应对生存压力(Parnwell et al, 2007)。④ 乡村多功能有助于建立起相互联系的网络,实现不

同社会经济部门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农村行动者之间通过功能的联系,并结合竞争和合作企业战略,实现公私产品(外部性)的多样化组合,从而满足对地方产品的多样化需求(Bassi et al, 2014)。

(2) 乡村发展对多功能的抑制作用。一方面,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农村行动者作出的一些决策可能会降低多功能质量,如年轻人外迁、城镇化进程中所导致的环境污损(Wilson, 2010a);另一方面,乡村发展的多功能模式多强调社会生产和环境资本,农业文化区可能被娱乐使用者所侵占,农民的经济收入可能会因此而受到损害,从而抑制乡村就业与社会保障功能。

2 研究区域概况与数据来源

2.1 研究区域概况

海南省位于中国的最南端,是中国唯一的热带岛屿省,下辖4个地级市、5个县级市、4个县、6个自治县。海南省旅游资源丰富、经济区位条件优越,自2018年建设自由贸易试验区以来,其社会经济发展迎来了新的机遇,但沿海和内陆仍存在较大差距,中部山区和少数民族地区贫困发生率较高,成为制约海南省全面乡村振兴的主要短板。中国贫困地区发展均面临类型多样、程度不等的区域性制约因素(刘彦随等, 2016),与中国中西部贫困区域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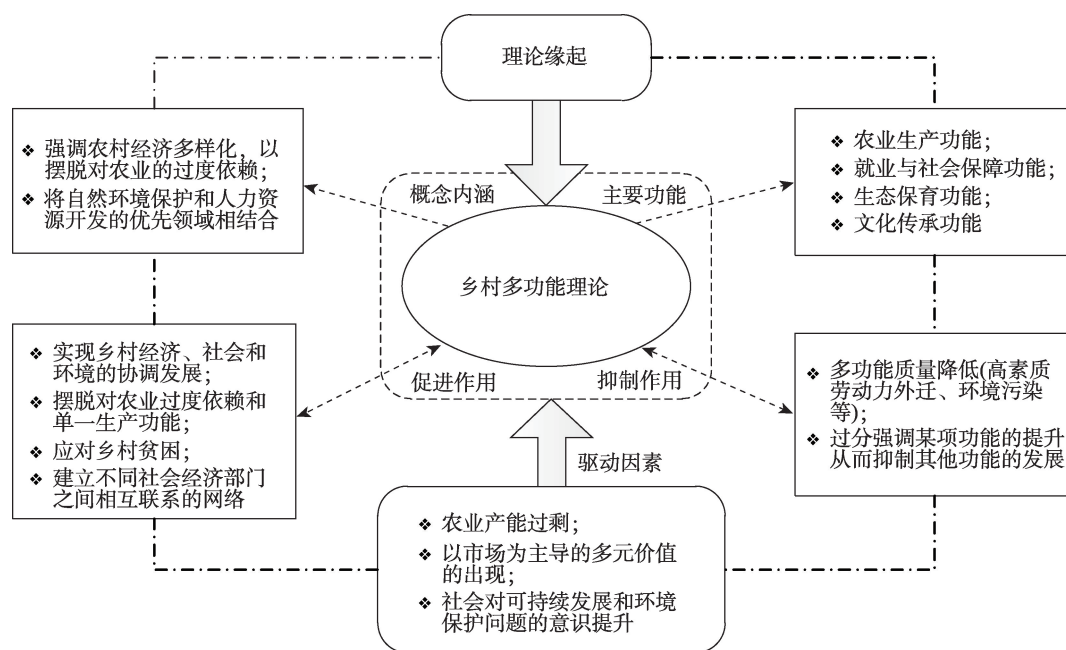


图1 乡村多功能理论与乡村振兴

Fig.1 Multifunctional rural development theory and rural vitalization

同,海南省受自然条件限制较少,贫困地区主要受基础教育和文化习俗等因素制约,而乡村多功能的农业生产、就业与社会保障、生态保育和文化遗产等功能在此类区域更容易调动发挥作用。因此,本文引入乡村多功能理论,从多功能视角探讨贫困村域演变特征与振兴路径,以期为海南省及中国扶贫开发 and 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参考借鉴。

什寒村位于海南省国家级贫困县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红毛镇,地处海南岛中部山区,是海南少有的黎族苗族混居村庄和海拔最高的村庄之一(图2)。因其海拔高、温度低,橡胶、槟榔等农作物生长缓慢,传统的农业发展模式无法满足村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农业生产水平低、基础设施条件差、教育水平低、贫困程度深等问题已严重阻碍了当地社会经济的发展。如何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发挥比较优势、带动村民致富,成为新时期此类乡村发展面临的重要挑战和机遇。2012年以来,在相关部门的支持下,什寒村立足环境优美、天然健康的资源优势和黎苗风情的文化优势,创新了乡村多功能发展模式。自2012年7月至2013年8月,什寒村“奔格内”(黎语,“来这里”的意思)乡村旅游品牌的发展经历了品牌摸索期、轮廓清晰期和正式对外公布期3个阶段,打造以“水果采摘”“黎苗风情”“农事体验”“森林科考”“田园风光”“红色印记”等为主题的10条“奔格内”乡村旅游路线,什寒村由贫困村成功蜕变为海南乡村旅游的品牌和典范。截至2017年底,村内有民宿33间、农家乐15家、土特产店11家、烧烤吧2家、茶吧1家。2013年

以来,游客数量每年同比增长超过30%,村民人均纯收入从2012年的3246元增长到2016年的13721元,增长了3倍多。

2.2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2018年1月,笔者对研究区乡村发展状况进行调研,通过对县领导、企业负责人、什寒村干部和村民的深度访谈,获取什寒村乡村发展、村内公共服务、基础设施建设和多功能演化的相关信息,社会经济数据来源于网上新闻报道和相关统计资料。

3 多功能视角下什寒村发展演化分析

3.1 乡村发展的演化特征及驱动因素

3.1.1 农业生产功能

乡村多功能强调农村经济的多样化,以摆脱对农业的过度依赖,重新配置地方资源、确定农业的社会作用和增加农产品的附加值有助于促进乡村多功能农业的发展。农业生产功能的发展演化表现为产业结构逐步优化和土地利用方式更加集约(表1)。2012年以前,什寒村产业结构主要以传统的种养殖业为主,单一的产业结构难以维持乡村社会经济的可持续发展。近年来在市场需求牵引、政府宏观引导等外源驱动及区位条件、资源禀赋和经济基础等内生驱动的共同作用下,什寒村实现了农业、农产品加工业和旅游业三次产业融合发展,形成“产业联动”效应。一方面,通过引导村民在从事农业生产的同时经营民宿、农家乐和土特产店,以特色的农产品、优美的自然风光和优质的服务,吸引游客前来游憩和消费,实现农、旅、文、体的融合和产业的创新发展;另一方面,企业通过对特色农产品进行统一包装、宣传,并依托互联网平台进行销售,实现线上线下同步发展,有效提高了产品的销售额和知名度。此外,专业规划团队对村内耕地、宅基地、商服用地等空间的统筹规划与设计,大幅提升了土地集约化利用程度。

3.1.2 就业与社会保障功能

贫困是制约农村发展的重要因素,也是弱势农村社区和弱势多功能性的关键组成部分(Rigg, 2006)。就业与社会保障功能的发展演化主要体现在参与主体的多元化、就业方式的多样化以及村民收入水平和幸福指数的明显提升。

乡村多功能发展有利于建立相互联系的网络,增强不同社会经济主体之间的相互作用,农村行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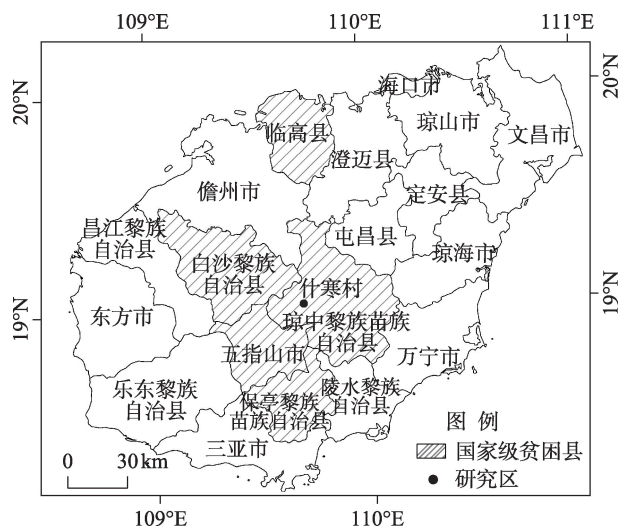


图2 研究区示意图

Fig.2 The study area

表1 什寒村乡村多功能演化的阶段特征及驱动因素

Tab.1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functions before and after tourism development and driving factors of multi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Zahan Village

主要功能	乡村旅游开发前	乡村旅游开发后	驱动因素
农业生产功能	① 传统种养殖业; ② 土地粗放利用	① 特色产业:益智、铁皮石斛、养蜂、高山茶叶等; ② 特色农产品加工业、“互联网+特色农产品”; ③ 旅游服务业:民宿、农家乐、土特产店等; ④ 土地集约经营	① 政策支持:扶贫开发、政府帮扶为乡村多功能演变提供了资金和政策支持; ② 市场需求:游客对自然风光的向往及以市场为主导的多元价值的出现;
就业与社会保障功能	① 传统居住场所; ② 传统就业功能	① 多功能居住场所:农户居住、旅游民宿; ② 就业形式多样:农业、旅游服务业、农产品加工业和管理服务等; ③ 参与主体多元:政府、农民、企业、游客等; ④ 景观多元化:文化广场、步行栈道、文化走廊、乡村客栈、露营基地等; ⑤ 经济收入、幸福指数明显提高	③ 自然本底:优美的自然环境为乡村旅游发展奠定了基础; ④ 资金技术:政府、企业、规划团队为乡村规划设计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撑; ⑤ 行为主体:乡村精英、技术能人发挥引领带动作用;
生态保育功能	① 生态服务功能; ② 生物多样性	① 生态服务功能; ② 生物多样性; ③ 美学功能:为游客提供清新怡人的环境体验	⑥ 文化特质:独特而富有魅力的黎苗文化对游客的吸引
文化传承功能	① 传统文化濒临衰败	① 黎苗文化的传承和发扬; ② 传统民俗体验:品尝黎苗美食、饮山兰米酒、唱山歌、跳竹竿舞、体验“三月三”传统节日	

者之间通过功能的联系,并结合企业竞争和合作战略,为乡村提供公私产品(外部性)的多样化组合,从而满足乡村对产品的多样化需求,实现减贫与发展(Bassi et al, 2014)。其相互联系网络表现如下:① 地方政府在加强社会资本和巩固关系网络方面的纽带作用。在什寒村发展历程中,政府发挥引领带动作用,在保护生态环境和黎苗文化的前提下,通过招商引资对村内进行危房改造、道路修建、饮水工程、文化广场和特色农业产业等项目的建设,为乡村旅游发展提供公共服务和基础保障。② 村民在社会生产活动中的主体作用。村民作为主人翁,通过经营民宿、农家乐、土特产店和成为相关工作人员等不同形式参与其中,由以往单纯的农业生产者,转变为集生产者、经营者和消费者等多重角色于一身,激活了乡村发展的内生动力。③ 企业在规划建设过程中的支撑作用。企业通过规划、投资、建设给乡村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撑,为乡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④ 游客在互动过程中的传输作用。外来游客在村内休闲、游憩和消费,带动村内经济发展的同时,向村民传输外部信息和先进的思维理念,从而提升村民的自我认识水平。据了解,全村 53.70%的村民主要收入来源包含了旅游服务业,各个岗位员工均从村内聘用,经营收入 60%归农民,35%归投资公司,5%归村集体,实现了农业劳动力的就地转移和多方共赢。

3.1.3 生态保育和文化遗产功能

一个典型的乡村地域系统,除了基本的农业生产功能外,还可产生景观、生物多样性、文化遗产和资源环境效应。现实中存在一种复杂的“政策机会地理学”,即某些农村地区将比其他地区有更多的机会实施强有力的多功能路径(Oostindie, 2018)。例如,风景优美的农村地区通常更容易增加经济和环境资本,城市边缘的农村地区往往拥有更多社会和经济资本的政策机会,而单纯的超级生产主义农村地区,提高多功能质量的机会往往有限(Vandermeulen et al, 2006)。

什寒村作为海南少有的黎族苗族混居村庄,在发展乡村旅游以前,由于区位条件差、经济基础薄弱等因素制约,贫困落后的局面难以维持农户生计,村内常住人口较少、信息闭塞,导致传统的黎苗文化濒临衰败。随着扶贫开发进程的推进、多主体积极参与和相关部门的高度重视,实现了乡村多功能质量的提升,其生态保育和文化遗产功能的发展演化主要体现在生态功能保护、美学功能提升和传统民俗的发扬传承等方面。狭义的“生态保育”特指乡村自然环境安全,而广义的“生态保育”涵盖了乡村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2个方面,是乡村物质与精神双重内容的结合。什寒村依靠得天独厚的自然风光和黎苗民族文化资源,吸引游客前来游玩体验,在开发建设过程中注重生态服务功能、生物多

样性和乡村景观的保护,为游客提供了清新的环境体验和闲暇放松的精神体验,对于进一步提升乡村生态保育功能具有重要意义。与此同时,游客们在村内品尝黎苗族美食、饮山兰米酒、唱山歌、跳竹竿舞,尽享黎苗民俗和文化风情,使得神秘而富有韵味的传统文化得以传承和发扬,拓展了乡村社会文化的内涵和外延。

3.2 乡村多功能发展的创新模式

什寒村依托优美的自然环境、特色的黎苗文化和政企的大力支持,以乡村旅游为切入点,借助“政府+企业+农户”的创新发展模式,在完善乡村基层服务组织和改善村内基础设施的基础上,通过利益共享机制的建立,实现了乡村农业生产、社会保障、生态保育和文化遗产多种功能的协调统一,为贫困村域乡村振兴发展提供了较为典型的示范。本文基于乡村多功能理论从农业生产、就业与社会保障、生态保育和文化遗产4个方面分析“什寒模式”多功能演化特征和驱动因素,以为同类型村域乡村振兴提供借鉴(图3)。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人们对乡村生产、消费、生态和文化体验等多元功能的需求变化,驱动着乡村功能不断发展演变(Rigg, 2006),功能的完善有助于产生集聚效应,吸引资金、人才和资源的集聚,促

进乡村社会经济发展。对于农业和乡村多功能,学者们强调社会、经济和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当经济、社会和环境资本交织在一起,创造出具有多种功能的不同空间概念模型,且3种“资本要素”都得到同样良好的开发时,乡村地域系统实现了最强的多功能性和弹性(Wilson, 2010a)。但由于自然资源条件和地理区位限制,各个村庄的经济基础和文化底蕴差异较大,并且考虑到道路、交通的可达性和建设过程中的资金问题,乡村发展的模式无法实现完全复制。乡村振兴发展应依托自身的资源禀赋和比较优势,积极调动多主体参与、多产业融合和多平台建设,挖掘乡村多重功能、重塑乡村多元价值,促进乡村发展更加多元化和规范化,实现全面的发展振兴。

4 多功能视角下贫困村域乡村振兴的路径探讨

乡村振兴应坚持系统思维,通过总体谋划、顶层设计、各个击破,以达到相互协调、形成合力 and 全面推进的目的(刘彦随, 2018)。乡村多功能可以帮助决策者将农村非市场商品和服务所带来的经济利益内在化(Domínguez-Torreiro et al, 2011),如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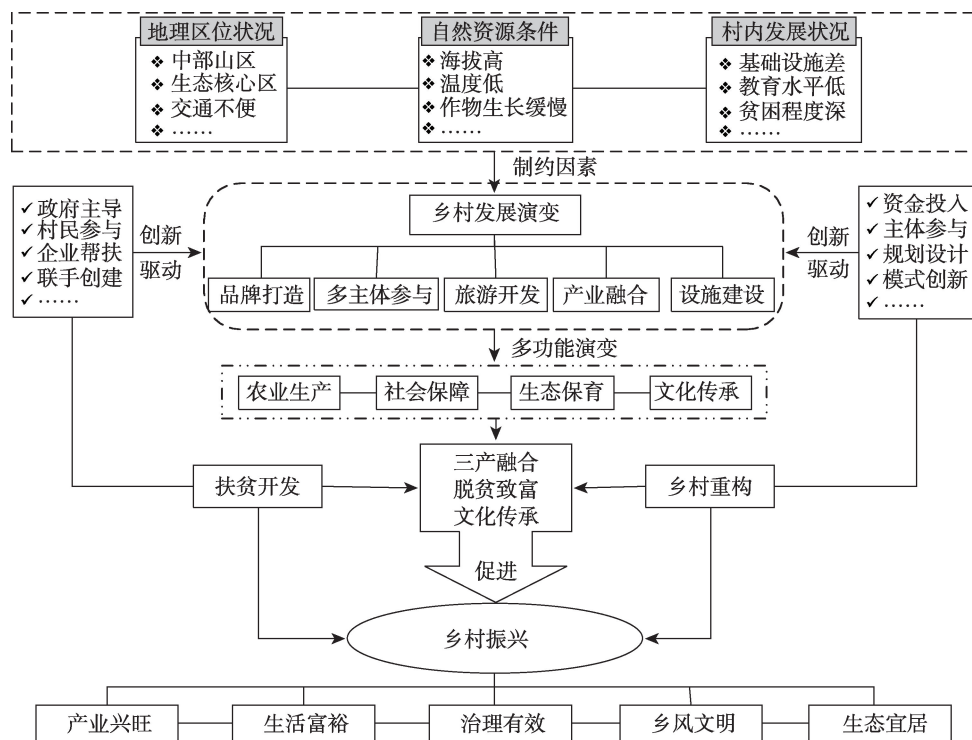


图3 “什寒”创新发展模式

Fig.3 Innovative model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Zahan Village

提升乡村多功能质量,实现全面的乡村振兴,成为乡村学科领域研究的重要课题。本文在分析什寒村多功能演化模式的基础上,进一步放大尺度,从多功能视角探讨贫困村域乡村振兴路径(图4)。

4.1 宏观层面——提供乡村振兴外援力

宏观(国家、省级)层面,相关部门应加强顶层设计和系统调整,通过制度设计、规划引领、政策支撑和战略保障全面提升乡村功能质量,促进乡村振兴。主要路径如下:①完善制度供给,激发乡村多功能发展潜力。一方面,健全的制度能够保证农村安全、有序地运行,激发乡村社会活力,促进各项事业蓬勃发展;另一方面,村庄的治理亟需系列制度跟进,用来支撑乡村文明、乡村稳定和乡村发展。因此,着眼加强农村基层设施建设,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制度(廖彩荣等, 2017),是激发乡村多功能发展潜力的重要途径。②合理规划布局,保障乡村多功能协调发展。科学合理的规划,有助于综合性、整体性、前瞻性和创新性地对区域发展进行总体布局(樊杰, 2015),保障乡村科学有序的开发建设,实现多功能协调发展。③强化政策支撑,促进乡村多元振兴发展。乡村发展所需要

的社会、经济和环境均需要相应政策的支持,差异化的应对政策有助于实现强有力的多功能农村发展道路(Marsden et al, 2008)。研究表明,可持续、多功能的农业集约化方法比每年单一种植方法的成本低得多,且更为多元;然而,对于政策制定者和农业部门来说,这是一项知识密集型的工作,需要跨越多个学科的综合集成和融会贯通(Münch et al, 2016),意味着乡村多功能路径所需的政策行动将更加复杂(Oostindie, 2018)。④实施战略保障,贯彻乡村多功能理念。战略实施有利于贯彻发展新理念、对当下中国农业农村发展问题进行科学合理的布局,可为“三农”工作指明方向。

4.2 中观层面——促进乡村振兴交互力

中观(市、县级)层面,借助城乡发展的交互力,增强乡村多功能质量,促进城乡融合发展。①城乡要素共享,促进乡村振兴交互力。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城乡间资金、技术、文化教育和思想观念等要素流在“时空压缩”效应下频繁交流,并逐步向农村涓滴(文琦等, 2019)。“涓滴效应”是城乡融合的重要过程,也是促进乡村多功能质量提升的重要途径。大城市和发达地区的贫困村域应充分利用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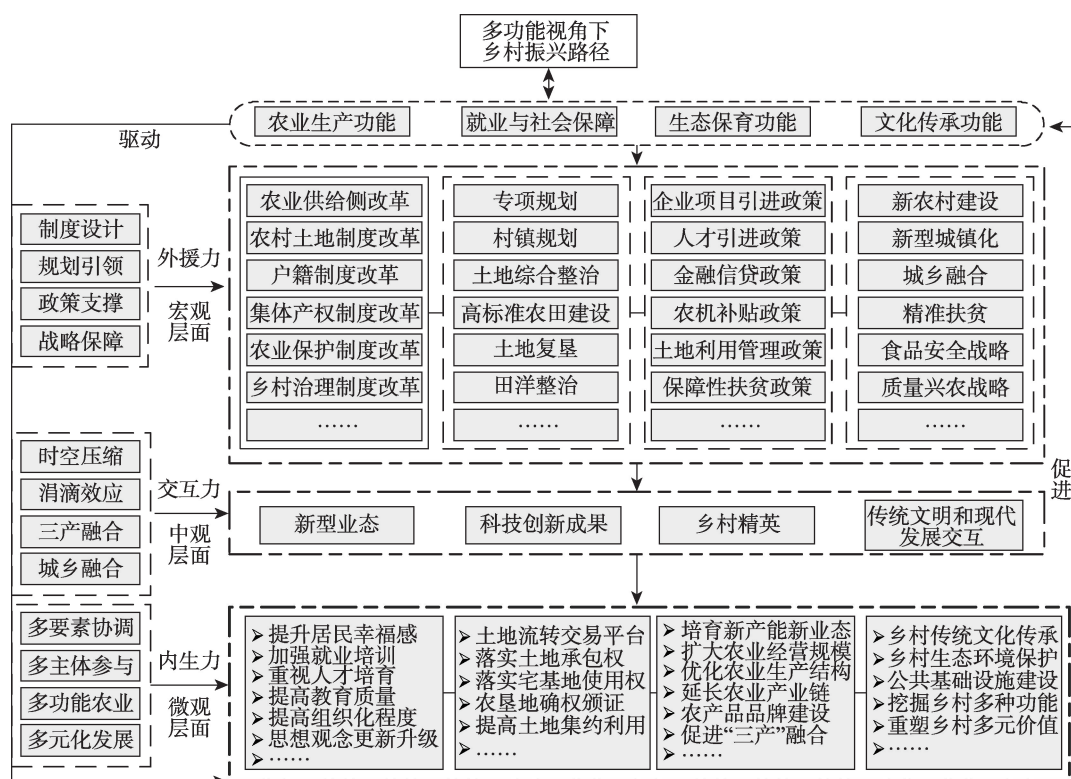


图4 多功能视角下乡村振兴的路径探讨

Fig.4 Alternative paths of rural vitaliz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functionality

边城镇的“涓滴效应”,积极引进大型公司、企业,发展新业态,培育新产业,带动周边农民就业和促进三产融合发展。此外,积极依托城镇化进程,充分利用各项科技创新成果,加速城乡融合发展,促进各类要素向农村流动、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加快农业剩余劳动力非农转移(龙花楼等, 2018b)。^②积极培育乡村精英,鼓励能人返乡创业。乡村精英是乡村生产生活各方面的领头羊和权利持有者,充分利用返乡民工、学子和企业家所带回的技术、智力、资本和人脉关系,以及他们所积累的经验和对市场的敏锐把握,提升产业振兴水平。^③对于自然条件优越、地方特色明显的贫困村域,结合自身优势发展乡村旅游,吸引城市居民前来观赏、游憩、消费和体验,游客感受乡村传统文化的同时,为村民带来外界新的信息和先进的思想观念,形成传统文明和现代发展的交互力,提升乡村的生态保育和文化遗产功能。

4.3 微观层面——激发乡村振兴内生力

村镇有机体是实现乡村振兴发展的重要载体(刘彦随, 2018),在微观(乡镇、村级)层面,注重激发各要素的内生发展动力,变“输血”型为“造血”型,促进乡村振兴发展。

(1) 引导多要素协调发展,增强乡村农业生产功能。^①随着城镇化进程的加快,乡村“三生”空间逐渐由传统的人居空间向新型复合空间转变,乡村土地开发利用面临着更为严峻的挑战(龙花楼, 2013; 李伯华等, 2018)。土地资源的盘活与乡村产业的衔接对于乡村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与资源的高效利用具有重要意义(龙花楼, 张英男等, 2018)。一方面积极搭建农村土地流转交易服务平台,加快推进农村土地确权登记颁证工作,盘活土地存量;另一方面严格实施土地用途管制,落实农户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的“三权分置”,提高土地集约利用程度。^②以多功能农业为依托,积极培育新型农业生产经营方式。农村新产能、新业态、规模化和专业化生产是国际农业转型升级的方向,结合区域比较优势,积极培育乡村休闲观光旅游业、电子商务、农产品加工业和农业生产性服务业等新业态(史玉丁等, 2018),通过优化农业结构、延长农业产业链和农产品品牌建设,提升农产品附加值和竞争力,破解传统种植业产出低和效益差等弊端,为乡村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活力。

(2) 以人为本,提升乡村就业与社会保障功

能。贫困村域由于自然条件恶劣、经济基础薄弱和教育水平落后等因素限制,农民生活水平和幸福感普遍偏低。一方面关注乡村留守老人、妇女、儿童和贫困人口的生计、教育与心理健康等问题,提升农村居民的幸福感;另一方面加强农民就业培训和人才培育,提高村民组织化程度和乡村教育质量,引导农民思想观念的更新和升级(王成等, 2018)。

(3) 乡村是中华文化发源和传承的重要载体,拥有众多的文化遗产和自然遗产,具有多元性和异质性。在产业发展的同时应注重乡村传统文化传承和生态环境保护,对于条件成熟的村域,定期举办富有民族特色的地方性文化活动,挖掘乡村多种功能和重塑乡村多元价值;对于具有生态涵养功能的限制开发区和禁止开发区,通过异地搬迁、生态补偿等方式,改善农民生产生活环境,实现乡村发展的生态保育功能。

5 结论与启示

本文在阐释乡村多功能理论概念内涵、驱动因素的基础上,进一步论述乡村多功能与乡村振兴发展的内在联系。以海南省什寒村为例,从多功能视角剖析贫困村域演变特征及驱动因素,总结其创新发展模式,结合典型贫困村域的调研从多功能视角探讨乡村振兴的路径选择,得出以下结论与启示:^①在内外驱动力作用下,什寒村实现了从单一农业生产功能向多功能路径的转变,一个典型的乡村地域系统,除了基本的农业生产功能外,还可以产生社会保障、景观、生物多样性、文化遗产和资源环境效应。^②什寒村通过建立相互联系的关系网络,实现了不同社会经济部门行动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对于满足乡村对产品的多样化需求,实现减贫与发展具有重要意义。^③乡村多功能的发展,对于实现乡村社会、经济和环境的协调发展具有积极意义,同时有助于提高农村社会应对内生变化和外部干扰的能力,增强乡村弹性。^④针对海南省典型贫困村域乡村发展存在的缺陷和制约因素,从多功能视角探讨乡村振兴的实现路径,从顶层设计、城乡融合发展和乡村内生发展3个方面分别表征推动乡村发展的外援力、交互力和内生力,通过总体谋划、各个击破,以实现全面的乡村振兴。

乡村振兴战略是新时期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的7大战略之一,受到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相关的

政策、规划措施陆续出台。乡村振兴涉及多学科、多领域和多层级的综合作用,亟需通过跨学科综合研究正确把握和研判乡村发展方向,联合各主体,打造乡村多功能价值体系,促进城乡产业优势互补,互为支撑,实现多种效益协调、多种经营主体共赢的乡村发展新格局(马历等, 2018)。目前全球许多相互关联的因素正在导致乡村多功能质量的降低(Wilson, 2010a),事实上,陷入贫困陷阱的农民很难找到提高多功能质量的方法,因为他们的日常活动将主要集中于增加足够的收入以维持生计(Gulickx et al, 2013)。乡村单一功能向多功能转变有助于增强乡村地域系统弹性,提高系统应对外界变故的能力,本文的分析框架和路径选择对于指导中国其他贫困地区的乡村振兴具有借鉴意义。乡村多功能强调外部性问题内部化、生产效率提高、考虑子孙后代的权利和农村行动者的高度反思性(McCarthy, 2005),如何提升乡村多功能质量、彰显乡村发展的自身规律,注重当代城乡关系下对乡村独特社会、文化等价值的挖掘(李红波等, 2018),激活乡村内生发展动力,统筹协调相关政策的制定,促进乡村发展由外部输血向内生供血机制转变,将是未来乡村发展研究的重要课题。

参考文献(References)

- 陈秧分, 黄修杰, 王丽娟. 2018. 多功能理论视角下的中国乡村振兴与评估 [J]. 中国农业资源与区划, 39(6): 201-209. [Chen Y F, Huang X J, Wang L J. 2018. China's rural revitalization and its evalu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functional theory. Chinese Journal of Agricultural Resources and Regional Planning, 39(6): 201-209.]
- 陈烨烽, 王艳慧, 王小林. 2016. 中国贫困村测度与空间分布特征分析 [J]. 地理研究, 35(12): 2298-2308. [Chen Y F, Wang Y H, Wang X L. 2016. Measurement and spatial analysis of poverty-stricken villages in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35(12): 2298-2308.]
- 樊杰. 2015. 中国主体功能区划方案 [J]. 地理学报, 70(2): 186-201. [Fan J. 2015. Draft of major function oriented zoning of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0(2): 186-201.]
- 房艳刚, 刘继生. 2015. 基于多功能理论的中国乡村发展多元化探讨: “现代化”发展范式 [J]. 地理学报, 70(2): 257-270. [Fang Y G, Liu J S. 2015. Diversified agriculture and r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 based on multifunction theory: Beyond modernization paradigm.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0(2): 257-270.]
- 傅伯杰. 2017. 地理学: 从知识、科学到决策 [J]. 地理学报, 72(11): 1923-1932. [Fu B J. 2017. Geography: From knowledge, science to decision making support.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2(11): 1923-1932.]
- 戈大专, 龙花楼, 张英男, 等. 2017. 中国县域粮食产量与农业劳动力变化的格局及其耦合关系 [J]. 地理学报, 72(6): 1063-1077. [Ge D Z, Long H L, Zhang Y N, et al. 2017. Pattern and coupling relationship between grain yield and agricultural labor changes at county level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2(6): 1063-1077.]
- 洪惠坤, 谢德体, 郭莉滨, 等. 2017. 多功能视角下的山区乡村空间功能分异特征及类型划分 [J]. 生态学报, 37(7): 2415-2427. [Hong H K, Xie D T, Guo L B, et al. 2017. Differentiation of spatial function in a mountainous rural area from a multi-functional perspective. Acta Ecologica Sinica, 37(7): 2415-2427.]
- 李伯华, 曾灿, 窦银娣, 等. 2018. 基于“三生”空间的传统村落人居环境演变及驱动机制: 南江永县兰溪村为例 [J]. 地理科学进展, 37(5): 677-687. [Li B H, Zeng C, Dou Y D, et al. 2018. Change of human settlement environment and driving mechanism in traditional villages based on living-production-ecological space: A case study of Lanxi Village, Jiangyong County, Hunan Provin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37(5): 677-687.]
- 李红波, 胡晓亮, 张小林, 等. 2018. 乡村空间辨析 [J]. 地理科学进展, 37(5): 591-600. [Li H B, Hu X L, Zhang X L, et al. 2018. On the analysis of rural space. Progress in Geography, 37(5): 591-600.]
- 李敏纳, 周春山, 蔡舒, 等. 2017. 海南建省以来经济增长空间分异格局演变 [J]. 经济地理, 37(2): 23-32. [Li M N, Zhou C S, Cai S, et al. 2017. The evolution of the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pattern of economic growth in Hainan since Hainan Province was founded. Economic Geography, 37(2): 23-32.]
- 李平星, 陈雯, 孙伟. 2014. 经济发达地区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及影响因素: 以江苏省为例 [J]. 地理学报, 69(6): 797-807. [Li X P, Chen W, Sun W. 2014.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of rural territorial multifunctions in developed regions: A case study of Jiangsu province.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9(6): 797-807.]
- 李智, 范琳芸, 张小林. 2017. 基于村域的乡村多功能类型划分及评价研究: 以江苏省金坛市为例 [J]. 长江流域资源与环境, 26(3): 359-367. [Li Z, Fan L Y, Zhang X L. 2017. Types division of rural multifunctions and their evaluation on village scale: A case of Jintan City, Jiangsu Province.

-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in the Yangtze Basin, 26(3): 359-367.]
- 廖彩荣, 陈美球. 2017. 乡村振兴战略的理论逻辑、科学内涵与实现路径 [J]. 农林经济管理学报, 16(6): 795-802. [Liao C R, Chen M Q. 2017. The theoretical logic, scientific connotation and achieving methods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strategy. Journal of Agro-Forestry Economics and Management, 16(6): 795-802.]
- 刘彦随. 2018. 中国新时代城乡融合与乡村振兴 [J]. 地理学报, 73(4): 637-650. [Liu Y S. 2018. Research on the urban-rural integr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the new era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3(4): 637-650.]
- 刘彦随, 李进涛. 2017. 中国县域农村贫困化分异机制的地理探测与优化决策 [J]. 地理学报, 72(1): 161-173. [Liu Y S, Li J T. 2017. Geographic detection and optimizing decision of the differentiation mechanism of rural poverty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2(1): 161-173.]
- 刘彦随, 刘玉, 陈玉福. 2011. 中国地域多功能性评价及其决策机制 [J]. 地理学报, 66(10): 1379-1389. [Liu Y S, Liu Y, Chen Y F. 2011. Territorial multi-functionality evaluation and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at county scale in China.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6(10): 1379-1389.]
- 刘彦随, 周扬, 刘继来. 2016. 中国农村贫困化地域分异特征及其精准扶贫策略 [J]. 中国科学院院刊, 31(3): 269-278. [Liu Y S, Zhou Y, Liu J L. 2016. Regional differenti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rural poverty and targeted poverty alleviation strategy in China. Journal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1(3): 269-278.]
- 刘玉, 刘彦随. 2012. 乡村地域多功能的研究进展与展望 [J]. 中国人口·资源与环境, 22(10): 164-169. [Liu Y, Liu Y S. 2012. Progress and prospect in the study of rural region multifunctions. China Population,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22(10): 164-169.]
- 龙花楼. 2013.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空间重构 [J]. 地理学报, 68(8): 1019-1028. [Long H L. 2013.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spatial restructuring.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68(8): 1019-1028.]
- 龙花楼, 屠爽爽. 2018a. 乡村重构的理论认知 [J]. 地理科学进展, 37(5): 581-590. [Long H L, Tu S S. 2018a. Theoretical thinking of rural restructuring. Progress in Geography, 37(5): 581-590.]
- 龙花楼, 屠爽爽. 2018b. 土地利用转型与乡村振兴 [J]. 中国土地科学, 32(7): 1-6. [Long H L, Tu S S. 2018b. Land use transi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China Land Science, 32(7): 1-6.]
- 龙花楼, 屠爽爽, 戈大专. 2016. 新型城镇化对扶贫开发的影响与应对研究 [J]. 中国科学院院刊, 31(3): 309-319. [Long H L, Tu S S, Ge D Z. 2016. Effects of new-type urbanization on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development and corresponding countermeasures. Journal of the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31(3): 309-319.]
- 龙花楼, 张英男, 屠爽爽. 2018. 论土地整治与乡村振兴 [J]. 地理学报, 73(10): 1-13. [Long H L, Zhang Y N, Tu S S. 2018. Land consolidation and rural vitalization. Acta Geographica Sinica, 73(10): 1-13.]
- 马历, 龙花楼, 戈大专, 等. 2018. 中国农区城乡协同发展乡村振兴途径 [J]. 经济地理, 38(4): 37-44. [Ma L, Long H L, Ge D Z, et al. 2018. Research on the ways of urban-rural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rural vitalization in the farming areas of China. Economic Geography, 38(4): 37-44.]
- 史玉丁, 李建军. 2018. 乡村旅游多功能发展与农村可持续生计协同研究 [J]. 旅游学刊, 33(2): 15-26. [Shi Y D, Li J J. 2018. The multifunctional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and the rural sustainable livelihood: A collaborative study. Tourism Journal, 33(2): 15-26.]
- 谭雪兰, 于思远, 陈婉铃, 等. 2017. 长株潭地区乡村功能评价及地域分异特征研究 [J]. 地理科学, 37(8): 1203-1210. [Tan X L, Yu S Y, Chen W L, et al. 2017. Evaluation of rural function and spatial division in Chang-Zhu-Tan Urban agglomerations. Scientia Geographica Sinica, 37(8): 1203-1210.]
- 唐林楠, 刘玉, 唐秀美. 2016. 北京市城乡转型与乡村地域功能的时序特征及其关联性 [J]. 人文地理, 31(6): 123-129. [Tang L N, Liu Y, Yang X M. 2016. Temporal characteristics and coupling of urban-rural transformation and rural regional multifunction in Beijing. Human Geography, 31(6): 103-106.]
- 王成, 马小苏, 唐宁, 等. 2018. 农户行为视角下的乡村生产空间系统运行机制及重构启示 [J]. 地理科学进展, 37(5): 636-646. [Wang C, Ma X S, Tang N, et al. 2018. Operational mechanism and restructuring of rural production space system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farming household behavior. Progress in Geography, 37(5): 636-646.]
- 文琦, 郑殿元. 2019. 西北贫困地区乡村类型识别与振兴途径研究 [J]. 地理研究, 38(3): 509-521. [Wen Q, Zheng D Y. 2019. Identification and revitalization of rural poverty-stricken areas in Northwest China. Geographical Research, 38(3): 509-521.]
- 徐凯, 房艳刚. 2019. 乡村地域多功能空间分异特征及类型识别: 以辽宁省78个区县为例 [J]. 地理研究, 38(3): 482-495. [Xu K, Fang Y G. 2019. Spatial differentiation and type identification of rural territorial multi-functions in Li-

- aoning Province. *Geographical Research*, 38(3): 482-495.]
- Bassi I, Zaccarin S, De Stefano D. 2014. Rural inter-firm networks as basis for multifunctional local system development: Evidence from an Italian alpine area [J]. *Land Use Policy*, 38: 70-79.
- Chaskin R J. 2008. Resilience, community, and resilient communities: Conditioning contexts and collective action [J]. *Child Care in Practice*, 14(1): 65-74.
- Derosa M, McElwee G, Smith R. 2019. Farm diversification strategies in response to rural policy: A case from rural Italy [J]. *Land Use Policy*, 81: 291-301.
- Domínguez-Torreiro M, Soliño M. 2011. Provided and perceived status quo in choice experiments: Implications for valuing the outputs of multifunctional rural areas [J]. *Ecological Economics*, 70(12): 2523-2531.
- Gulickx M M C, Verburg P H, Stoorvogel J J, et al. 2013. Mapping landscape services: A case study in a multifunctional rural landscape in The Netherlands [J]. *Ecological Indicators*, 24: 273-283.
- Holmes J. 2006. Impulses towards a multifunctional transition in rural Australia: Gaps in the research agenda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2(2): 142-160.
- Liu Y S, Li Y H. 2017. Revitalize the world's countryside [J]. *Nature*, 548: 275-277.
- Marsden T, Sonnino R. 2008. Rural development and the regional state: Denying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in the UK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24: 422-431.
- Mccarthy J. 2005. Rural geography: Multifunctional rural geographies - reactionary or radical? [J]. *Progress in Human Geography*, 29(6): 773-782.
- Münch A, Nielsen S P P, Racz V J, et al. 2016. Towards multifunctionality of rural natural environments? An economic valuation of the extended buffer zones along Danish rivers, streams and lakes [J]. *Land Use Policy*, 50: 1-16.
- Oostindie H. 2018. Unpacking Dutch multifunctional agrarian pathways as processes of peasantisation and agrarianisation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61: 255-264.
- Parnwell, Michael J G. 2007. Neolocalism and nascent social capital in northeast Thailand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D: Society and Space*, 25(6): 990-1014.
- Pribadi D O, Zasada I, Müller K, et al. 2017. Multifunctional adaptation of farmers as response to urban growth in the Jabodetabek Metropolitan Area, Indonesia [J].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 55: 100-111.
- Renting H, Rossing W A, Groot J C, et al. 2009. Exploring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A review of conceptual approaches and prospects for an integrative transitional framework [J].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90: 112-123.
- Rigg J. 2006. Land, farming, livelihoods, and poverty: Rethinking the links in the Rural South [J]. *World Development*, 34(1): 180-202.
- Vandermeulen V, Verspecht A, Huylenbroeck G V, et al. 2006. The importance of the institutional environment on multifunctional farming systems in the peri-urban area of Brussels [J]. *Land Use Policy*, 23(4): 486-501.
- Wilson G A. 2009. The spatiality of multifunctional agriculture: A human geography perspective [J]. *Geoforum*, 40: 269-280.
- Wilson G A. 2010a. Multifunctional quality and rural community resilience [J]. *Transactions of the Institute of British Geographers*, 35(3): 364-381.
- Wilson G A. 2010b. Multifunctional rural land management: Economics and policies [J]. *Environment and Planning C: Government and Policy*, 28(4): 759-760.

Characteristics of change and vitalization pathways of poor villages based on multifunctional rural development theory: A case study of Zahan Village in Hainan Province

MA Li^{1,2,3}, LONG Hualou^{1,2,3*}, TU Shuangshuang^{1,4}, ZHANG Yingnan^{1,2,3}

(1. Institute of Geographic Sciences and Natural Resources Research,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2. College of Resources and Environment, University of Chinese Academy of Sciences, Beijing 100049, China;

3. Key Laboratory of Regional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Modeling, CAS, Beijing 100101, China;

4. Institute of Geography and Oceanography, Nanning Normal University, Nanning 530001, China)

Abstract: For most regions in rural China, poverty is an important factor restricting rural development. In order to reduce excessive dependence on agriculture and single production function, rural multifunctionality is receiving increasing more attention. Multifunctional rural development is to a great extent conducive to reducing the incidence of poverty and improving the ability of rural communities and families to face the pressure of survival.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China, this study used field investigation and semistructured interview results to analyze the characteristics of change and driving factor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poor vill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ultifunctionality.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model of Zahan Village, we further explored alternative pathways for vitalizing poor rural villag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1) Under the influence of "policy opportunity geography", Zahan Village has experienced a transition from a vulnerable poor rural village to a village with diversified functions. 2) The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social security,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and cultural heritage protection in rural areas has positive implications for improving the level of rural socio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enhancing rural resilience. 3) Factors driving rural multifunctional transition include policy support, market demand, natural environment, capital and technology, stakeholders, and cultural traits. 4) In view of the constraints of rural development in poor villages, it is proposed to provide external support for rural vitalization from the macro level, promote synergistic interaction from the meso level, stimulate endogenous forces from the micro level, and achieve rural vitalization through overall planning and various breakthroughs. Finally, based on the multifunctional rural development theory, the dilemmas and prospect of rural vitalization and development were discussed.

Keywords: rural vitalization; rural poverty; multifunctional rural development theory; alternative pathway; Hainan Province